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五五 ——  
(二〇〇三年九月十六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09d)

---

【史海钩沉】1966：正本溯源说《通知》——兼复宋永毅先生	余汝信
【学术争鸣】认真的治学态度和牵强的微言大义 ——公布一份文件并再答余汝信先生	宋永毅
【掌上历史】水滴石穿，别有洞天 ——评刚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润芝
【人物春秋】毛泽东的政治艺术	单世联
【研究动态】再现文革——报导二则	
【历史见证】捕捉真实的文化大革命——记李振盛和他的文革摄影作品展	刘见林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海钩沉】

1966：正本溯源说《通知》  
——兼复宋永毅先生

• 余汝信 •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按文革语言，称之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并称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5·18)。今天，我们之所以重视它，不仅因为其内涵最充份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文革理念，更因其产生及发布的过程，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高层政治斗争中所使用的种种策略和手腕的一个重要标本。

### 一、5·16《通知》的产生过程

述说这一过程，笔者主要依据两方面的文献：其一是中共官方编撰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其二是当事人王力、穆欣的回忆录。同时，参考其他文献资料，按时间顺序梳理如下：

### 1、1966年4月9、11、12日 北京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代出访的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参加。会上，康生传达毛对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和指示。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消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通知由陈伯达起草；（二）拟决定成立一个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

12日会后，周恩来、邓小平与彭真联名写信将会议情况及陈伯达起草的《通知》稿，报告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周恩来年谱》下卷，页2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45）。

在批判彭真的问题上，周恩来是毛的监军。有论者称，毛泽东是利用刘少奇出国的机会揭开了彭真的盖子，此说有理。毛深信驯顺的周决不会逆他的意，刘少奇在，把握性则没有那么大。

王力说：“在北京起草文件（那时还不叫五·一六通知），只有几个人，不叫起草小组”，“另外成立起草小组，在上海”（《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页585），此说恐不确，录以备考。

起草小组，就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王力说，起草小组“名义上是给常委扩大会议准备文件。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同上书，页585），据穆欣称，根据当时印件过录到笔记本上的名单，起草小组中还有刘志坚（《劫后长忆》，和平图书·新天出版社，页76）。5月28日中央正式通知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中，去掉了吴冷西、陈亚丁，增加了王任重，谢镗忠、姚文元。

### 2、4月14日 杭州

毛泽东收到周、邓、彭4月12日的信及所附的《通知》稿，即将其送达正在上海的江青，并附函称“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接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8）。

同日，毛泽东致函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日（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接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同上书，页39）。

上海同志，指的是江青、张春桥。从姚文元批吴晗的文章，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再到5·16《通知》，都与在上海的江青戚戚相关，江是功臣。江青说她是毛的哨兵、学生，其实，她才是毛的“亲密战友”，只不过此时的江青，尚在幕后。

### 3、4月16日 杭州

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抵达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在杭州期间，周恩来同彭真谈话三次（《周恩来年谱》下卷，页28）。

4月20日，出访返国的刘少奇从昆明赶到杭州，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此时，批彭木已成舟（《刘少奇年谱》下卷，页636）。

#### 4、4月24日 杭州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次日，会议结束（5·16《通知》附件二，大事记）。

从4月16日至24日，起草小组成员主要住在上海锦江饭店。据王力说，《通知》稿毛泽东几乎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张春桥，再交我们讨论”，“毛主席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后来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笔加的。有些虽然不是黑体字，但问题提得很尖锐的，也是他加的”（《王力反思录》，页587）。

至于王力的回忆录说到“常委会并没有讨论和通过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对五·一六通知的修改，并不给常委会看”（同上书，页587），那是为周恩来、邓小平的开脱之辞。据现有的大量文献资料说明，周恩来、邓小平参与了5·16《通知》起草、修改的全过程，参与了批判彭真的全过程。

#### 5、5月16日 北京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5·16《通知》附件二，大事记）。

#### 6、5月19日 北京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将《通知》编号为中发（66）267号中共中央文件，共印39，985份，以机密件发至县团级党委，《通知》附件一、二随文下发，附件三、四、五、六另发（详见本文第四部份）。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于5月4日至26日由刘少奇主持举行，毛未参加，惟由康生每天向其汇报会情。换言之，5·16《通知》及其附件发出之日，会议尚远未结束。5·16《通知》说彭真将二月提纲“匆匆忙忙发到全党”，其实，毛泽东更为匆匆忙忙。

王力在回忆录中说，“康生带着定稿回北京，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将这文件印发。当时不相信中办印刷厂，怕他们同彭真、杨尚昆关系密切，怕他们泄露给彭真。康生要我去找谢富治，到公安部印刷厂印刷，要绝密”（《王力反思录》，页590），此为王力一家之言，未有旁证。事实上，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早已于1965年11月接管中办，杨尚昆早已离开这个中枢要地，王力自己也说，彭真自杭州回京途中已被“警卫”起来（那时好像还没有“隔离反省”一说），况且，在毛的淫威之下，彭真本人也被迫参加了批判自己的5·16《通知》的起草过程，那么，还怕向他泄露些什么呢？

## 二、毛泽东对《通知》的修改

从4月14日到18日，毛泽东对《通知》草稿进行了多次修改，修改稿有的是在杭州派人送至上海，有些是由秘书徐业夫一字一句用电话传达到上海。这些修改文字，《建国以来毛泽

东文稿》已全文刊录，但未有注明每段文字修改的具体日期，根据穆欣回忆录引述的当时的记载，详情是：

4月14日。修改的地方主要是第九段和文件结尾部份以及文件开头部份的一句话。第九段增加了以下两处：“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和“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文件开头部份增添的一句是：“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文件结尾倒数第二、三段，几乎全为毛泽东所加：“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

4月17日。是毛泽东修改最多的一天，首先修改的是第一段和第三、四段中的三处。

第一段增添的是批评《二月提纲》“（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第三段增添：“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第四段增添的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通知》最末尾一段，也是毛泽东于17日添加的：“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

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4月18日，毛泽东言犹未尽，又增加了第六段开头和第七段的一句话。第六段开头是：“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第七段中毛泽东添加了一句：“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学阀”，后经起草小组修改引申为“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这段修改，以后也算入了毛泽东的帐。

穆欣将《通知》所反映的毛泽东的文革理念作了一个归纳：“这个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又经他本人多次修改后定稿的《通知》，集中地反映了一九六二年以来他和中央一线领导发生的明显分歧，以及他对当时党和国家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由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和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出现了修正主义。在他看来，一批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经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都有他们的代理人。他为自己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受到重重阻碍，无法推行，而对刘少奇等处于一级的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日益加重。当他把这些情况同他总结的苏联共产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教训联结起来时，对党和国家的前途表示了更深的忧虑，担心资产阶级复群的危险，决心发动群众，进行一场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劫后长忆》，页87—88）。

从1966年6月1日起，已被内部夺权的《人民日报》，连续五天发了六篇社论，题目分别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盖布》和《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社论所传达的，就是尚未向党外公开的5·16《通知》精神，以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所作所为，理论依据实际上也还是5·16《通知》。

### 三、1967年“公开本”的改动

1967年5月17日，经过技术性修改的5·16《通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公开发表，我们暂且将它称之为“公开本”，将1966年5月仅限于党内传达的，称之为“机密本”，两者相比较，有如下四方面的不同：

#### 1、标题

1966年机密本：仅为“通知”两字；

1967年公开本：“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 2、黑体字

1966年机密本：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未有特别标示；

1967年公开本：修改过的段落和文字，全部用黑体字明显标示。

#### 3、“同志”称谓

1966年机密本：提到彭真名字的地方有四处，名字后面有“同志”的称谓；

1967年公开本：彭真名字后面的“同志”两字全部已删除。

#### 4、落款

1966年机密本：有“中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落款；

1967年公开本：为免与标题不一致，落款部份全部删去。

“公开本”以上的修改，以标题的修改最为值得重视。

5·16《通知》的名称，康生1966年5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言时作过说明：“顺便解释一下，这么重要的一份文件，叫《通知》好不好？我同伯达考虑过。少奇同志和陈总都考虑过，问主席，主席讲还是叫《通知》”。

5·16《通知》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这次会议出席者约80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23人，部份委员如彭德怀、张闻天虽保留名义，但已不出席中央会议，能出席者满打满算21人（包括被批判的彭真、陆定一），其余60人（包括文件起草小组推荐的江青、张春桥等8人），全是在北京工作和临时抽调在京工作的，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没有参加。

扩大会议，或换一个说法，将会议按需要而扩大，是毛泽东的常规性武器，包括常委扩大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等等。

以这么一个奇特的组合，以一个《通知》的形式，即决定了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政治命运，这就是毛时代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特色。

虽然，中共的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但在1966年初，毛泽东还是有一些讲究，未有完全打破党内的一些游戏规则，非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文件，都没有使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而仅用“中共中央”或“中央”的名义，以指代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形式上补办了追认同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手续，批准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的决定，同时决定撤销他们的职务；批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的决定。全会还形式上“完全同意”了八届十中全会至该次全会期间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后十条”及“二十三条”。

5·16《通知》并没有拿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再去说什么事。它在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改用我们惯常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行文形式实际上是《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称，并未得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授权。5·16《通知》说彭真“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是自己打自己嘴巴，1967年“公开本”，才是真正盗窃了“中央委员会”的名义。

“公开本”标题改动的主事者是谁？未能查证。但根据现有材料，毛泽东既然审阅修改了为《通知》公开发表而写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并在文章结尾处加了一段话，不可能不知道《通知》本身的这个改动。

毛泽东所加的一段话是：“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351—352）。

到1967年，毛泽东已不用顾虑什么党内的游戏规则，不要说盗窃一下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就是盗窃全党的名义，你又如何。

#### 四、5·16《通知》的附件

5·16《通知》共有六个附件。推测毛泽东的用意，是用它来增强揭批彭真的说服力。

附件一为“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该提纲已于当年2月12日作为中央正式文件下发过一次。按《通知》附件二“大事记”的说法：“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大事记”只是说批语没有送毛审阅，并没有说提纲原文没有送给毛看过，毛是看过提纲的，只是没有明确表态同意与否（彭真可能也真的未讲清要下发）。提纲这次重发，是作为批彭的反面教材。

附件二为“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按王力的说法，附件二“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专门搞大事记的人。他把毛主席历次谈阶级斗争的话都排起来，这次又排了个大事记。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刘邓同意。我是参加整理，还有李鑫、贾一学”（《王力反思录》，页600）。

附件三题为“肖华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肖华主要讲了两大点，“第一，关于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第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肖华在讲到第二点时，指责彭真“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等极不正常的关系”，“对杨尚昆的问题，办了两年没结果，就是因为彭、罗自己有鬼”。

附件四题为“杨成武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杨讲了三大点：“第一，彭真在晋察冀的错误”，“第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第三，极力插手军队工作”。

附件五题为“关于彭真 在国际活动中的王明路线（刘宁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刘宁一在发言中提及：“我所讲的关于彭真同志在国际斗争中的错误问题，是与康生、伍修权、王力等同志一起初步想到的”。

附件六是“关于彭真错误的一批材料”。

后四个附件，并未与5·16《通知》正文一并发至县、团级党委，更没有发到文化机关党委。196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311号机密件通知各地、师级以上党委：“中央决定，将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的附件三、四、五、六，发到地委和军队师一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干部”。这四个附件，与中发（66）268号文件（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的六个附件发放范围相同：“这个报告所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以及叶剑英、肖

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到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肖华、杨成武在中共建国以后，与彭真并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工作关系，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批彭发言的人也不会少，为什么特别要转发他们两人的发言？令人费解。可能，这就是以后江青所说的“请尊神”吧，请解放军这尊神。

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原因，肖华、杨成武在揭批彭、罗过程中表现突出。这种积极的态度，为他们赢得了一时的丰厚报酬。1967年3月，肖、杨与谢富治、粟裕一道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他们还同为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肖华则继续当他的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负责人。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及两年，他们相继倒台。

昔日战友的批判揭发，往往比组织上枯燥的乾巴巴的政治判决文本，更令人过目难忘。

文革后期及文革之后，揭批者与被揭批者都获得了政治新生。为1966年的一幕，后人尚不知道他们是否仍心存芥蒂。我们倒是确切地知道，被揭批者的下一代始终耿耿于怀。

诗人元帅叶剑英在揭批罗瑞卿的发言中，因罗跳楼而套用了辛弃疾的词句，认定了他政治生命的死亡。罗的女儿多年后写道：“爸爸命太大，他没有死，只是落地的时候摔断了右侧的足跟骨。他做到的，只是让那个旨在折磨人的三月会议停开了。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诗里写：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悲天悯人，感慨万端，何等风流洒脱。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这些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但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罗点点：《点点回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页215）

罗点点冷嘲热讽的，自然是叶剑英的发言。

## 五、1972年重印本引起的话题

笔者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187期），曾以5·16《通知》为例，对该《文库》的编纂方法提出过诚恳的批评。《文库》的主编宋永毅先生随即进行了自我辩解，并对笔者进行了反批评（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第188期）。

为了不致于有曲解宋先生的原意之嫌，以下全文引用宋先生文中的这段反批评的话：“如果说上述校勘只涉及古籍，那么我就用余先生一再强调的5·16通知的校勘为例，来说明群众组织的出版物的不可轻视。在编纂时我手头就有这一文件的‘中央文件的原件（重印件）’，而且印者为最权威的‘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1日印发）。这一文件非没有任何附件，还把原文件标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改为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也未作任何说明。另外，我还有几种群众组织的传单，但是它们无论在标题或附件上更忠于‘原著’，至少有附件1和附件2。校勘的结果是：我们运用了群众的传单的标题和附件2。事实证明，它们更为完整准确”。

这一段话，反倒暴露了宋先生在文革史识及文献编纂方法上的更多问题。



1972年中共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中共中央为“教育干部”需要，重印了一批自1962年至1972年5月十年间的中央文件，分别汇编成数集，供参加会议者使用（中共中央同时授权各省市党委进行了少量翻印）。《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部份中央文件汇集》是其中之一，但并非最为重要，因会议主要是批林，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文件才是重点。该汇集共收录中共中央文件19件，5·16《通知》是其中的一件。宋先生在上面一段文字中没有说清楚的是，所谓中办1972年印发的那几个字，并非印在5·16《通知》该份文件之上，而是印在整个汇集的封底页。

宋先生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1、该汇集中的所有文件，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均按原件重印，没有进行过任何标题或内文的改动（仅按文件编印顺序重编了页码）。中央办公厅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去改动以这样形式重印的原件，事实上它也没有这么做。

2、该汇集其实是一个文件选编本，重印原件而不重印它的附件并不奇怪。重印5·16《通知》是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附件主要是针对彭真本人的，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批林，彭真不是当时的主要批判对象。

3、从宋先生的文章中笔者可以推断，宋先生并没有看过5·16《通知》1966年5月的原件，否则，不会错责汇集“还把原文件标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改为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事实上，“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仅是文件汇集目录的标题，它是准确的，没有错，汇集中的通知重印件标题并没有作过改动，仍为《通知》两字，它既然是重印件，也无法改动。

4、宋先生并不清楚5·16《通知》的标题是在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才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准确地说是《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历史事实，所以，误信群众组织传单上1967年“公开本”的标题才“更忠于原著”，所以，才会有“千万不要迷信中共的官方文件和它们的‘第一手’的汇编”这样奇特的感叹，所以，才会采用以群众组织的传单去“校勘”中央文件原件这样不合乎逻辑的反方向操作的做法。

笔者在对《文库》错误的编纂方法进行批评之前，当然阅览过《文库》光碟上我们论及的每一份文件，并非无的放矢，宋先生在文中说我们是“想当然”，非也！以5·16《通知》为例，正因为笔者阅览过《光碟》的登录件，才会批评宋先生用1967年“公开本”的标题，拼装在1966年“机密本”正文之上，而且，宋先生还在“公开本”的标题之后加了“及原件附件2”几个字，使其显得更不伦不类。

我们批评宋先生不作题释，宋先生作了冗长的辩解，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辩解不过是因史识不足而做不出来的挡箭牌。以我们对文革那么一点“一定的研究”水平，试为恢复原标题的《文库》登录版的5·16《通知》作一题释：“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重印件登录。《通知》在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标题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正文部份多处作了技术性改动。《通知》有多个附件，除附件一“二月提纲”已于原文日期处登录外，现仅登录编者认为与正文关系最密切的附件二”，如何？对研究者的帮助是否更大一些呢？

我们曾从理证和物证两个角度，质疑过《文库》入选的部份文件的可靠性，宋先生对此也进行了反质疑。其实，宋先生大可超脱一些，为我们所质疑的文件作一题释：“根据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1973年4月编辑出版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登录。学者中有指其为伪作，存录备考”，不是比编纂者自己掺和进争论中更好一些吗？

文革研究发展到今天，应该是也有条件是多学科知识的整合。我们并不否认宋先生对文革初期阶段的红卫兵运动有一定的研究，但这并非等于说宋先生对文革的其他阶段有研究；我们也不否认宋先生在文学史领域可能有一定的造诣，但文学史也仅仅是整体历史学的一个部份。如果我们将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都弄得如此混乱不堪，那么，更遑论八百年前以至更久远的什么宋唐晋魏？（2003年9月）

□ 作者为中國大陸文革史研究學人

~~~~~  
【学术争鸣】

认真的治学态度和牵强的微言大义  
——公布一份文件并再答余汝信先生

• 宋永毅 •

《华夏文摘》的编辑转来了余汝信先生的新作“1966：正本溯源说《通知》——兼复宋永毅先生”，因为余先生在文中又一次对我主编的光盘进行了新的批评，按西方学界的规矩，我再一次作答。直率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在西方学界是家常便饭，余先生称自己为“中国大陆文革史研究学人，”我不知道是否会习惯，为此，我如同上次作答时一样再一次申明在先：“我的答词中如有不敬之处，也望余先生多多谅解”。

首先，我要高度肯定余先生有关5·16通知产生过程的考据。从这一方面来看，余先生的治学态度是认真的，探索是可贵的。可惜的是在史实上有很重要遗漏。高文谦先生在他数月前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通知成文过程已有很详细的考证，引用了中央档案馆的好几个重要文件，如“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的谈话（1966年3月28—30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全文（1966年4月2日）”等等。这些极为重要的原始文件，余先生可能因为在国内没有看到，对海外文革研究的新成果无法了解，因此在文中竟一点没有提及，实在是一大遗憾。但这不是余先生的错。我愿意帮助余先生购买该书，以支持余先生的深入研究。

其次，我要在此简要作答的有如下两件事：1）“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中央支左部队进驻各大军区、省军区的若干指示（1968年6月10日）”是否来自台湾？2）中共对5·16《通知》的题目在1967年公开发表时有没有作什么修改？这两件事就史实而论都是小事，但它们涉及到值得注意的治学方法，我就又只能大不敬地批评余先生了。

1）文件并不来自台湾：批评切忌主观

我曾在上次作答中告诉余先生，《光盘》中所收的这一文件直接来自文革中的传单，但即便是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1973年4月编辑出版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我们调查结果是：来源也是文革中的传单而不是伪造。学术研究中不能因为编纂者是在台湾，便象余先生第一次那样，马上斥之为“未辨真伪，错误地登录了来源可疑的伪造文件”和“台湾方面为其需要有目的地伪造一些对中共不利的文件，投放到大陆地区以制造更多的混乱”。余先生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说明，这次又一定硬要我作一个题释：“根据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1973年4月编辑出版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汇编》登录。学者中有指其为伪作，存录备考”。

上次说余先生“想当然”余先生觉得太重，但是主观主义是一点不过份的。我们登录的文件是以下两个来源：1）美国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1980年出版的《红卫兵资料续编（一）》第1，897—1，898页。这是一个当时云南省军区政治部复印的铅印件的复印件；2）美国明尼苏达州远东研究图书馆特藏的云南文革传单。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一文件，我乾脆全文公布于文后，以饷读者。我不知道余先生在知道了这些真实的来源后，是否对“台湾特务说”有所释怀，并对台湾的学界同行有所歉意。如果余先生还不信我们有这些原件，请给我邮址，我可以复印件寄来。

2）中共没有对5·16通知的题目在1967年公开发表时作什么修改：研究更不要追求微言大义

余先生在他第一次批评我们错误地按照5·16通知的公开件登录进《光盘》时，是说我们“如‘5·16通知’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1967年公开发表时毛泽东修改或添加的文字特别以黑体字排印，而1966年的原件并非以此形式排印”。经我作答，余先生知道我们手头有该通知的1972年中央文件的重印本，且《光盘》中也没有用黑体字和删去任何字，大概他不好再批评这点。这次便又改一个话题，批评说“宋先生并不清楚5·16《通知》的标题是在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才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准确地说是《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历史事实”。看了这一批评，真使我悲喜交集：喜的是，余先生对中共文件标题的认真钻研态度；悲的是，余先生的钻研过了头，以至最普通的报纸、杂志“标题”和“作者”都读错了、搞颠倒了。打开1967年5月《红旗》第7期第1页（《人民日报》5月17日也登了），5·16通知的全文开头排列如下：

通知（第一栏，大字黑体，居中；是“题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栏，空格；中字黑体，居中；为“作者”）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第三栏，空格；中字；居中；是“时间”）

我不知道余先生是怎么读出一个“准确地说是《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荒唐的标题来的。殊不知当时在《红旗》《人民日报》主持工作的陈伯达、王力等人都有一流的文字功夫，他们是不会搞出这样一个混乱不堪、不伦不类的标题来的。正确的史实是：中共在公开发表时并没有作标题上的改动，是余先生自己读报时读错了。

那么，余先生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与他的学术水准极不相称的读报常识错误呢？看了余先生这次有关5·16通知的全文，我才明白：他要借此指控毛泽东的“罪行”。他说：“5·16《通知》并没有拿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再去说什么事。它在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改用了我们惯常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行文形式实际上是《通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称，并未得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授权。5·16《通知》说彭真‘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是自己打自己嘴巴，1967年‘公开本’，才是真正盗窃了‘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余先生的主要依据是：《通知》的“公开本”用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署名而不是“中共中央”或“中央”，为此便需要“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授权”。这是一个认真过头而变成追求微言大义的做法。其一，人人皆知“中共中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简称，就象“国务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简称一样，两者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其二，文革中的中央文件使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称的不少，如“1969·07·2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1969·08·2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1976·09·0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1976·10·0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的决定”等等，等等。都没有经过中央全会投票授权，你能说这都是“盗窃了‘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以我的浅见，似乎把它解释为用全称在某些场合显得更正式严肃，从而使某一文件显得更重要一些更为妥当。但是与“盗窃了‘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其三，余先生有什么理证和物证说明按中共的法规，一个中共中央的《通知》（这与全会“决议”之类完全不一样）如用全称发表就一定要“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授权”？你有那一年的中共党章或政治局的文件作依据？我与余先生一样，对朝令夕改、反手云雨的毛泽东深恶痛绝，但我同样反对用微言大义、急于求成的方法去指控他或任何“敌人”（如“台湾”、“中共”）没有犯过的“罪行”。我这样批评不知余先生是否会感到委屈，但余先生研究中的这一倾向却实在是值得注意的。

如同余先生推断和我在上次的答词中承认：我们没有 5·16 通知的 1966 年的“机密本”，因此误以为通知的原来标题是流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篡改”了标题，更不是有什么微言大义值得深究的事。因为这一标题的稍作改动，一没有改动原意，无关大局；二更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加上“附件二”的说明更便于检索。如同余先生自己也承认的：它也不是 1972 年重印本文件汇集目录的标题“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而仅是简单的“通知”两个字。并且，1972 年重印本略去了附件而未作任何说明。由此可见，连中共中央这个“作者”自己对这类标题的小改动也不当一会事。

当然，我还是愿意接受余先生的一个建议。凡手头已经有原件的在再版时可以加题释。鉴于余先生手头有许多我们有的中央文件的原件，对标题问题又有非常认真的研究。我在此就公开邀请余先生参加我们《光盘》再版的题释工作，尤其是凡有他有原件的都先加以注解。凡余先生给《光盘》再版写的题释非但有署名，而且出版后还有薄酬。文革研究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事业，我在上次反批评前就通过《华夏文摘》和余先生联系，邀请他一起参加这一工作。在上次的作答中，我又公开邀请了一次。这里，我再诚恳地邀请一次。我们或许有不同的学术见解，但是目标应当是一致的。余先生已有我的 E-MAIL 地址，欢迎随时和我联系。

余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写了 5·16 通知的几个附件的概要，但如同余先生自己所说，概要和原文毕竟差距太大。希望你能公布全文“以正历史真相，以饷万千读者，而不是藏之名山，贻误了它们的历史功用”。如果涉及打字费用，我们都愿意承担。余先生意下如何？最后，我在此再一次向余先生的批评指教表示感谢，我的答词中如有不敬之处，也望余先生多多谅解。

◇ 附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中央支左部队进驻各大军区、省军区的若干指示

1968. 6. 10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的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勇敢地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了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进攻，光荣地担负起“三支”、“两军”的艰巨任务，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立下了最伟大的功勋。

目前全国大部份省、市、自治区已先后完成了革命大联合，建立了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委员会。这是对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沉重打击。但是，敌人是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福建、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省、自治区至今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激烈反映。来自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伙同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从中央到地方，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设置了重大的障碍，妄图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他们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搞乱我们的阵线。在革命队伍中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大搞右倾翻案风，妄图向毛主席施加压力，向党中央施加压力。

恰恰和敌人的愿望相反，他们越是阻碍和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他们的灭亡就越快。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与广大群众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阻止不了的。

为了适应当前革命形势的需要，为了巩固已经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和促进尚未大联合的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想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精神，由中央军委直接授权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称中央支左部队），进驻各大军区、省军区执行支左任务。

“中央支左部队”的职权和任务如下：

#### 一、协助地方驻军执行支左任务的问题

（一）“中央支左部队”是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指挥的支左部队，是军委支左工作的全权代表。

（二）地方驻军应在“中央支左部队”的协助下，更好地忠实执行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命令，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确实地担负起“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三）凡是还未进驻支左部队的地区，“中央支左部队”必须迅速进驻；特别是至今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或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而革命秩序出现混乱的地区更应加强驻防，以便与地方驻军一道协助革命群众，对一切企图破坏革命大联合，企图分化革命委员会的反动逆流给予坚决的打击。

（四）“中央支左部队”有权监督地方驻军的支左工作并纠正其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坚决取缔“山头主义”和各自为政的“分裂主义”。

（五）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兵种的地方驻军负责人因在支左工作中犯原则性的错误而又拒绝“中央支左部队”的纠正和帮助者，可以拘留查办。率部抵抗者得解除其部队武装，上报处理。

#### 二、处理革命群众组织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凡在运动中散发或被抢走的枪支弹药，“中央支左部队”必须全面负责收回。对于抗

拒缴交武器的坏头头及其顽固追随者均可进行逮捕法办，并予强迫缴械。武力抵抗一律采取军事行动制裁。

（二）对于那些继续挑动武斗、制造流血事件、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首恶分子，必须严惩。

（三）对于继续制造混乱、煽动群众围攻解放军的一小撮顽固分子，“中央支左部队”有权自由还击和给予必要的制裁。

（四）由于派性斗争以至未能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地方，“中央支左部队”应协助双方立即就地谈判协商。县谈判不能达成协议时，可派代表赴省协商，省谈判不能解决时，可派代表来中央协商。任何一方都不能以任何藉口拒绝参加谈判。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发扬无产阶级党性。

（五）“中央支左部队”要向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大力宣传教育，无论任何地区，凡是继续挑动武斗或挑拨拒绝参加大联合协商，企图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或搞分裂主义的幕前幕后指挥者，必须老老实实向人民请罪，向毛主席请罪。顽固到底者，予以逮捕。受蒙蔽者反戈一击有功。

### 三、关于“平反”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一）中央支左部队应大力支持革命群众继续深入彻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击右倾翻案风。但对那些曾犯错误而被打成“牛鬼蛇神”的革命群众，则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发布的“关于平反问题的八项指示”进行复查。

（二）对于过去曾犯观点或方向性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后，不得扣予任何帽子或歧视。

（三）“中央支左部队”进驻后，应向所属地区颁布紧急恢复生产令，整顿革命秩序，进一步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违者分别予以停发工资或自动离职论处。

### 四、加强对阶级敌人专政的问题

（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地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无产阶级革命新秩序。

（二）坚决打击混进革命组织内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美蒋特务、苏修特务、日本特务的各种间谍活动；对那些窃取国家情报、泄露国家机密、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加强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监督管理，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为了保证大联合的顺利进行和巩固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应该根据各地情况的需要，对四类分子集中管制，劳动改造。

（四）坚决剥夺四类份子翻案闹“造反”的一切政治权利，如发现进行阶级报复或以各种形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者，坚决镇压，不施仁政。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

云南省军区政治部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六日复印

注意事项：

（1）本件除各省军区可统一制发分别发至各专区革命委员会、军管会、地区驻军领导机关以供内部遵照外，一律不准翻印。

（2）不得流传至上列机构以外的机关单位和革命群众组织。

~~~~~

### 【掌上历史】

水滴石穿，别有洞天  
——评刚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 润 芝 •

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案头上摆放着中英文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目录索引》一书

这套由美国狄金森学院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学者宋永毅先生主编的文库，以光碟及其目录索引读物的形式，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于2002年底出版、中大出版社发行。这套文库的光碟收集了一万篇左右的原始文件，总字数近三千万字；它所附的目录索引一书十六开本近四百页，约七十万字。这套文库的问世是世界范围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这个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编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有哪些特色呢？

首先，其特色在于“全”。

文化大革命作为二十世纪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经历十年，涉及到中国大陆社会的各个角落，关系到数亿人的命运，成为现、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迄今为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众多的缺陷、偏差和遗憾。诚如宋永毅先生所言：“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学者还是国际汉学界的文革研究都还存在不少困难。其中很重要的是原始的历史资料和系统性的整理工作的双重缺乏。”（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目录索引》，页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以下引用只注明同一书页码）“海内外文革研究中由史料问题引发的史实的错讹、真相的曲解和研究的空白仍普遍地存在，阻碍着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的进展。”（页4）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宋永毅、石之瑜、丁抒、周原、沈志佳、郭建、周泽浩和王友琴等八位学者，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走遍了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藏，抢救了无数第一手的文字资料，在数以百万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进行专业的编辑校勘，”（页4），终于汇集成了这套呈现给全世界的文库。

这套文库具有以往任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献资料汇编所难以企及的丰富、详细和全面的特点。这套文库不仅涵盖面广，信息量大，而且时间跨度长，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具体，更主要的是，对于文革的林林总总的问题加以系统地、恰切地界定和分类，给研究者以及广大读者的

查阅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套由余英时先生作“序”、宋永毅先生撰写“总导言”的文库，包括了七个部份：一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公报汇编；二和三分别是毛泽东、林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四是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五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六是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的重要文献；七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重要文献。实际上，从这七个部份的内在机制、相互关系和演进过程中，人们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大致走向、脉络和归宿。另一方面，这套文库尽管是以汇编中共中央、毛泽东、林彪以及其他中央首长关于文革的文件、指示、讲话等为重点，但是，与此同时，它最为显著的一点则在于收集了文革中红卫兵、群众运动的诸多重要文献，特别是文革中与官方正统的文革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异端思潮的诸多重要文献。而这一点恰恰是为过去所有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文献资料汇编所不及的。换言之，这套文库的重大价值表现在它几乎囊括了文革时期自中央到地方、由官方到民间、从正统到异端的重要文献。毫无疑问，就涉及到文革时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方方面面而言，至今还没有哪一文革文献资料汇编达到了这套文库的全面性水平。

的确，这套文库不只是中国一地一域的，而是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学者或有关方面共同努力的成果；它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为它的编纂等工作是在北美地区进行和完成的；它不只是属于八位编者的成就，更是众多有志于文革研究的学者和关心文革研究的人士所共同期盼、帮助和推进的结果。当然，在这里，以宋永毅先生为代表的八位编者的辛勤工作和集体合作是功不可没的；在文革研究领域，编者们对这套文库所作的贡献是真正值得大书一笔的。

其次，其特色在于“独”。

据我所知，这套文库是目前世界上所有文化大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中唯一的电子版本（或曰光碟版本）。面对浩如烟海的文革文字记载的东西，经手上万篇的文革原始文件，处理三千多万字的文革各类文献，正如宋永毅先生所言：“如果采用传统的印刷出版，可能有数百本之多，连存放都很不方便。而现代计算机技术却使它们能浓缩在一盘体积极小的光碟之中，而且还能够运用‘作者’、‘标题’、‘时间’和‘关键词’等等途径检索。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个文库光碟正借助于现代科技，在史料汇编方面完成了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并重的‘文革博物馆’。”（页4）

的确，这套文库光碟及其目录索引真正起到了一碟一册在手，电脑在前，文革文献资料乃至文革全局在胸的作用，可谓“掌上十年史，胸中万篇文”。这套文库实质上为文革研究者和文革关心者以及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极为便利的、现代电子化的、流动的“文革图书馆”或“文革文献资料库”。它不仅采用中文和英文两种目录而成为在国际学术界可通用的文革文献资料编纂及其研究的权威代表，而且直接给人们带来了在文革文献资料方面，查阅更为方便，检索更为简易，复制更为迅捷，保存更为可靠和传送更为广泛等等好处。这套文库也应该是当今任何一个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层次的图书馆所必须具备的，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上述这种图书馆关于文化大革命图书目类中的代表作，可谓“图书馆中的图书馆”。这套文库的完成和确立，不同于过去文革文献资料的编纂动辄以百万字计或千万字计的丛书集刊等形式出现，而是以现代电子技术的方式把过去传统的编纂方式改变成了现代的、崭新的、高科技化的和极为迅速便利的编纂成果。这一点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文革文献资料编纂工作的一项重大的突破，也是整个海内外文革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的创造。

再则，其特色在于“新”。

这套文库在如前所述的七个部份中，使其每一部份的内容，按照先后顺序的方式，几乎是逐一排列了每一个文革文献资料的完成或发表的时间，展示了这些文献资料的原有的内容。然



而，这套文库不只是简单的编集，而是做出了应有的分析和新颖的评论。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编者在每一部份之始所加写的清晰、简练和深刻的导言中。仅仅是这些提纲挈领的导言，就为整个文库增色添彩了许多。这些导言对于文革的诸多历史现象的批判，鞭辟入里；对于文革的诸多问题的审视，一针见血；对于文革的阶段、过程和全局的把握，入木三分。我个人认为，阅读这套文库，应对上述的这些导言予以充份的重视和强调。

例如，对于文革初期富有特殊含义的文革领导者——“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反过去在中央文件、指示、公报等方面的保密作法的分析，编者指出：为了更大更深地利用群众运动来发动、促进文革，“唯一有效的方法必然是把这些文件直接发给群众，或有意无意地把党内秘密泄露给它们所操纵的群众组织，以便利用群众运动作为他们党内清洗的有效工具。”（页5）

关于文革初期流行各种各样的关于毛泽东的讲话、指示、文稿等文集，编者认为：“事实上，公开正式发表的版本也不尽全是原貌的真实反映。在汇编的编校过程中，就能发现一些正式发表的版本有不少地方是做过润色、修改甚至删除处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记录稿和当时非官方印发的版本在考订文献原貌方面，还有着特殊的功用。而本汇编所收录的那些至今尚未（也许永远不会）被官方正式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献则是尽可能全面地研究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思想及其发展演变的一部份难得的宝贵的资料。”（页44）

关于林彪文革时期的讲话、指示和文章，编者强调：“值得一提的是：林彪的讲话、指示、文章并不全部是对毛的思想、指示的复制。在同一声道上，他又有自己的特点和创新。可见要彻底搞清文革错综复杂的发展脉络，不研究林彪的这些讲话、指示、文章是不行的。”（页59）

在评价文革初期被群众广为翻印和流传的“中央首长”的讲话和指示时，编者写道：“它们不是中共官僚们千斟万酌后写下的书面文件，而是即时即地脱口而出的鲜活言辞。‘言为心声’，就更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他们所代表的中共党内各个派系的动向和利益所在。”（页64）

对于有关文革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的评价，编者断言：“当时的人们学会了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不断猜测政治斗争的性动向，养成一种文革时代特有的政治敏感性。”（页117）

关于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编者做出了恰切的界定：“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主要是指文革期间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中央文革及各级革委会公开批判过的文革中所谓‘左’的或‘右’的‘反动思潮’。这些思潮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矛头直指或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体制，在其流行程度上更有其极大的广泛性与群众性。这些孕生流衍于民间的‘异端思潮’与中共上层的权力、派别斗争并不相关，也区别与任何个人的反毛反体制的行动。……简而言之，文革中的异端思潮是一种在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从而也代表了他们艰难却真实的觉醒程度的民间思潮。”（页148）

我个人还要说的是，这套文库在给文革研究者带来很大鼓舞的同时，它也是给文革研究者提出的一个严肃的挑战甚至是一个严峻的鞭策。面对这套文库，我们要不断反问自身的是：文革研究领域为什么在文革发生后的几十年里，尤其是在文革的故乡里，没有产生或出现与整个文革的沉重和苦难相匹配的思想反思和精神批判的成果呢？进而，我们要一直追问的是：那些曾经亲身经历了或目睹了文革风雨的所有的中华儿女，能不能在其有生之年里创造出或收获到上述的反思和批判呢？这种反问和追问决不是是什么危言耸听，至少，《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就给我们树立了一座警示钟。

据说，《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刚出，它的编委和出版者已经投入了补充大量新发现的材料出修订版的工作。可以预见：若干年后的修订版《文库》将在各方面都百尺竿头、更进一丈！

□ 作者为中国大陆的文革研究者

~~~~~  
【人物春秋】

毛泽东的政治艺术

• 单世联 •

〔本文摘自单世联：“读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文，文中引文所标页码均指薄书——编者〕

◇ 剥夺权力的方法

毛泽东是政治艺术的大师，可以有很多办法来加强或剥夺一个人、一个部门的权力。第一种办法是保留位置，却不分配其具体工作。朱德长期被尊为“总司令”，但军权从不让他染指；“文革”中很多老干部并没有被彻底打倒，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位置都留着，会议上可以坐主席台，但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有的还不断挨批，甚至行动也不自由。

第二种办法是不通知开会。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政治局开会并不通知他，这个委员也就有名无实了。1976年，毛想限制叶剑英，就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

第三个方法是不发文件。1955年，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在农村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小脚女人”的错误。“8月26日，毛主席批示邓小平、杨尚昆同志：‘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请批发此类电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P357）中央即毛泽东，“从8月13日到10月2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中央批语”，重新部署合作化发展步伐、加快发展进度的报告。（同上）这样一来，中央农村工作部机构不变、领导不变，但主要权力却被毛一个批示剥夺。

第四种办法是另组机构。1963年批判邓子恢时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形式，1966年3月，他又向中宣部发出警告：“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P1277）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是另组替代性的机构。大跃进前后毛对国家计委屡屡不满，因为谁都跟不上毛的思想跃进。1964年8月，在陈伯达给李富春的信上，毛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P1242）1965年初，毛决定成立以余秋里等人组成的小计委。“毛主席还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总理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他们的工作。”（P1244）如果不是李富春聪明，让小计委的人都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以便过渡一个时期后接管现在的计委，那么国务院就会出现两个计委的现象。

毛泽东是策略大师，除上述方法外，他在关键时刻可以冻结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以保证实现自己的意图。1942年，毛意欲彻底战胜王明等“教条宗派”和周恩来等“经验宗派”，但由于这些人占据着政治局的多数，毛遂于6月2日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接管并未明文取消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直到1945年“七大”才恢复重新建立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1967年“二月逆流”后，毛再度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政治局，直到1969年“九大”之后重新组成政治局。

## ◇ “农村包围城市”的活用

“农村包围城市”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即使在49年以后的对内斗争中，他也运用得炉火纯青，这就是以地方反中央。比较大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1956年“反冒进”批周恩来以为大跃进作准备：“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P636）于是，钢产量翻一番由上海首先提出；人民公社首先在河南诞生，北京的任务是事后认可和宣传论证。

第二次1966年批彭真以发动“文革”。这一年3月他在上海同康生等人的谈话中：号召“向中央进攻”，5月的中央文件上也有“向中央进攻”的字样。

他还针对3月11日许立群同志根据彭真同志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的问题（许立群同志在电话中讲了“学阀”问题并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作者注），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P1278）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不但夺了旧上海市委的权，实际上也夺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权。

“农村包围城市”优势在于能保持主动和进攻的姿态，这一经验培养了毛对农村、边缘而不是城市、中心的特殊感情。借用毛经常为别人准备的帽子，可以说毛的思维方式属于经验的教条主义或教条的经验主义，就是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教条化、先验化、迷信化。毛总是把战争时代积累的一些经验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戒律，即使在环境变化之后也不允许有任何改动。暂不评论这一思维方式的是非得失，仅从毛自己来说，他实在是太珍视自己的成功经验了，决不舍得用一次就放弃。比如“诱敌深入”的战术与“引蛇出洞”的“阳谋”就一脉相承；军队供给制的传统延伸到大跃进期对商品经验的拒绝，如此等等。从这一思维特点可以把号召地方造反的做法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联系起来。

中央以毛为核心，但核心只是一个人，中央还有一大批高级领导人和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他们不可能完全与毛声气相应，很可能出现外围与核心配合不好的情况。如果坚定的固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毛的核心地位就会落空。这样，地方力量就成为毛的依靠。60年代初，刘少奇的威信大大提高，“一国二公”几成定局，毛非常紧张，除加紧批转各类文件外，1961年还专门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写信，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许诺自己一定给他们回信。当然，毛不是一般地希望地方凌驾于中央之上，地方向中央造反的唯一理由就是毛的号召，毛的真实目的是以地方平衡中央。当他觉得中央是他得心应手的工具时，地方就要服从中央；当他觉得中央“做坏事”时，就以地方逼中央就范。地方和中央是毛的两张牌，他可以永远处在主动者的位置上，牢牢地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

~~~~~

## 【研究动态】

### 再现文革——报导二则

## ◇ 文革收音机、记录电影唤起旧日回忆（根据多维社慕育金报导）

招贴画、样板戏、革命歌曲、老照片、像章、语录……。这些闪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古董文物能够将任何生长在中国大陆、如今三十岁以上的华人带回文化大革命的岁月当中。新版记录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就好像一座博物馆，保存来自那个岁月却至今仍未逝去的政治和文化印迹。

由曾经联手执导纪录影片《天安门》的导演卡玛（Carma Hinton）、高富贵（Richard Gordon）、白杰明（Geremie Barm）拍摄的反映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记录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9、10月间在美国上映。

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两小时篇幅展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历史。学者朱学勤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那是一个诗人与刽子手共同统治的时代，诗人在这个年代上布满了玫瑰花，刽子手在这个年代的后面拖下了长长的恐怖的身影。”

纪录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片名出自一句广为流传的毛泽东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影片以1964年到1971年间发生的事件为主体，上溯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和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下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四人帮”的倒台及数年后对他们的审判，时间跨度纵横数十载。

配合影片的电脑网站（<http://morningsun.org>）收藏有声音、视频、图像、文字等各种珍贵的文革史料，以多媒体方式展现文革旧貌。读者可以收听文革时期的电台，收看电视，观赏样板戏、革命电影，甚至还有革命青年的日记，表达当时中国民众盲目崇拜政治领袖的真切心情。

据介绍，《八九点钟的太阳》以新中国同龄人的经历为主要线索，探讨共产党建国后不断激进的革命教育与革命文化对这代人的影响，讲述当时处于不同地位的人的不同经历与感受，以及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卷入政治运动的复杂动机，从而力图再现这代人在二三十年间由最初的创造乌托邦理想社会的革命激情转变为对现实的冷静而独立的思考的心路历程。

《八九点钟的太阳》不以编年记事的方式来综述文革，它侧重于展示曲折的个人故事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以此来发掘文革这样一个对千百万个人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内涵。影片中的十几位受访者中，有分别来自三个家庭的成员——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和女儿刘亭、文革期间因言致罪而遭枪杀的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及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和女儿李南央。影片将观众带入这几个不同的家庭，从他们的遭遇中更贴近地了解那段历史。影片的其他受访者包括在红卫兵运动中深具影响力的骆小海、文革中被媒体歪曲利用的宋彬彬、为文革留下珍贵的图片影像见证的摄影师李振盛和赵立魁、著名画家黄永玉、学者朱学勤、徐友渔、王力雄等。

《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由 Long Bow Group 制作，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提供主要经费，于9月、10月在华盛顿DC、波士顿、纽约等地公映，上映日期和地点请查看：<http://www.morningsun.org/film/distribution.html>

◇ 李振盛文革摄影展巴黎首展（根据于洋报导）

中国著名摄影家李振盛个人作品展由法国文化及联络部主办，由法国摄影文物与遗产局和美国联系图片社(CONTACT)联合承办。于6月26日在巴黎市中心的叙利宫(Hotel de Sully)

法国摄影文物与遗产博物馆开幕，该影展题为《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叙利宫的大门口及庭院中，悬挂两幅高达3米的印有李振盛大幅肖像的影展广告牌。

李振盛的环球巡回影展，由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担任策展人。为配合此次影展，由普雷基编辑的李振盛作品画册《红色新闻兵——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路历程》一书同时出版，该画册的法文版书名定为《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小红书》。首页是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的亲笔题词：“让历史告诉未来——李振盛‘文革’摄影作品集”。由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乔纳森·斯潘斯教授（Jonathan D. Spence，中文名：史景迁）作序，由普雷基撰写前言，书中还有美国作家、诗人雅克·蒙纳斯奇（Jacques Menasche）在近三年里对李教授作长达200小时访谈后撰写的3万多字长篇访谈文章，成为李先生的口述自传体回忆录。

这次影展和画册中所收入的照片中，有20幅曾于1988年3月在北京举办的“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大展中荣获最高奖——系列新闻照片大奖。

影展及画册所采用的全部作品，均系李振盛从1963年任《黑龙江日报》记者起，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他调到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任教之前的20年间拍摄的，以李振盛本人从“四清”运动到“文革”运动十多年的经历与作品为主线，讲述他个人的亲历的曲折故事及其心路历程。

自1999年以来，普雷基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李振盛拍摄的数万张珍贵底片中反复进行筛选出285幅反映中国“文革”十年历史的照片用该书中，又从中精选158幅照片在影展中展出。同时，影展中还展出了30多年前李振盛任职《黑龙江日报》的10多个完整版面的照片。此外，还特地用4个大玻璃柜展出李振盛当年使用过的许多实物：黑龙江日报社在“文革”中颁发的印有“最高指示”的两个《记者证》，由毛泽东手书的“红色新闻兵”和“红卫兵”的红袖标，他阅读并保存的各种不同版本的“红宝书”，下放柳河五七干校时所填写的“五·七战士”登记表，采访毛泽东主席逝世追悼大会时佩戴的白布黑字记者条，为配合政治形势的需要而改头换面的新闻照片原件，他任摄影记者20年所发表照片的剪报本……这些“文物”成为参观者极感兴趣的“聚焦展品”，人们对李振盛能够细心地将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却完好地保存下来表示惊讶，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却又令人敬佩的事情。

影展开幕前夕的6月中旬，李振盛夫妇应邀从纽约来到巴黎，在近10天的时间里接受了30多家媒体记者的采访。主流媒体及权威评论家一致认为：李振盛个人新闻摄影作品涵盖了“文革”前后的历史全过程，反映中国人民的那段苦难历史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可谓空前绝后！并对李先生历经艰辛顽强地拍摄并冒险保存下如此珍贵的历史资料所付出的勇气表示钦佩！

“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这是中国摄影老前辈吴印咸先生1962年在李振盛当学生时对他的教诲，他在回答法国记者提问时，多次提到这句足以影响他整个摄影职业生涯的话，正是这句话时时刻刻激励着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和自身人性的弱点，去以镜头完整地记录下那十年浩劫当中的每一段历史！几万张保存完好的底片今天终于可以向世人展示那段特殊的岁月。当西方记者问及李先生，是否当年就有身负使命感，李振盛回答：“当年，我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似乎有义务应当完整地记录这段历史。今天，我能够无愧地向我的同胞、向法国和全世界人民展示中国文革十年的苦难历史，就是为了让这种历史悲剧不要在我的祖国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上重演！”李先生一再说，“文革”发生在中国，但它应当是属于世界的。常言道“经历即是财富”，他认为“苦难的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

李振盛摄影作品展，是一项环球巡回展览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此次在巴黎为首展，到9

月21日结束。随后，按签约计划继续赴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荷兰、瑞士、瑞典等12个欧洲国家博物馆巡展，每处展期均为三个月，到2006年底结束欧洲巡展。同期，还将安排在美洲、亚洲、澳洲和非洲各国博物馆巡回展出，约需时6至8年。

~~~~~

## 【历史见证】

### 捕捉真实的文化大革命 ——记李振盛和他的文革摄影作品展

• 刘见林 •

三十多年前，李振盛的工作是给中国的黑龙江日报拍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人民的幸福生活。但是，在拍摄制作这些宣传照片的过程中李振盛逐渐认识到，他所从事的也应是一件记录历史的工作。因此他在拍摄报社所需要的新闻照片的同时，开始将镜头对准文革中阴暗一面的东西，并将拍下的底片深藏于家中的地板下。这在当时是非常冒险的事情。

现在，李振盛终于有了机会将这些照片公之于众：6月27日到9月21日，从三万多张照片中精选出的152张在巴黎摄影历史博物馆（Patrimoine Photographique）展出；9月，李振盛还将推出他的《红色新闻战士》一书，其中包括285张照片和个人回忆录。

虽然近些年来中国已经公开了不少记录文革期间社会动乱的资料照片，李振盛的这些照片仍具有其独特之处：它们以令人震惊的细节讲述了在一个远离西方视线中国边远地区（黑龙江）的草根阶层在文革期间所发生的故事——其中只有一次，1966年，李振盛造访北京时拍到了毛泽东本人。

现年63岁的李振盛学的本来是电影摄影专业，但是1963年他所就学的长春电影学院被迫关闭，而他也被分配到了黑龙江日报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他在工作首日的日记中如是记载：“我不会老死在黑龙江的。”

不久后，尚未从“大跃进”中恢复过来的中国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农村教育。李振盛也加入了这个运动，他去了距离哈尔滨东南30英里的阿城。在那里他除了参加军事化的农村生活外，还拍摄各种各样的照片：劳作、无休止的讨论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会、社会主义破坏份子批判大会。

1966年，李振盛回到了报社，但同时，毛泽东也宣布发动文化大革命，历史突然间加速了。“我和别人一样兴奋，这种感情是真实的。我们很幸运自己能经历这种时刻。”李振盛说。很快，黑龙江省领导被红卫兵推翻，黑龙江日报的编辑们也被驱逐了。“我注意到那些戴着红卫兵臂章的人可以自由地拍照。”李振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因此他迅速在报社内部成立了一个名为“红色青年战斗小组”的红卫兵组织。“从此，只要我戴上臂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拍照，没有人敢阻止。”

但是，李振盛很快便开始被他所看到的和拍到的震惊了：洗劫教堂和寺庙；搜捕私人家庭；焚烧书籍……。“作为一个有良好教育的青年，我认为这种行径是不正常的。在我们拍摄欢笑的同时，暴力场面变得越来越明显。”李振盛说。报社只刊载反应文革光明一面的图片，但李振盛拍摄一切事情。“我的老师，著名的摄影家吴印咸说，我们不仅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历史的

记录者。我觉得光明只是历史的一部份，所以我也拍摄社会阴暗面，这样，有朝一日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历史画面。”因此，除展示挥舞着红旗、捧着小红本的青年外，李振盛的镜头也捕捉高级知识分子戴上涂满口号的纸冠被批斗、被当众侮辱和损害的场面。甚至当时枪决死刑犯和不同政见者的场面也在他的视野之内。

到1968年，李振盛开始将他拍摄的底片埋藏到地板下。此时，随着不同红卫兵派别的权力争斗，哈尔滨的局势更加乱；而在报社，李振盛被指控多项罪名——先是被降级，随后，于1969年和他的妻子一道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洗澡”。

“事情越来越傻。所有的人都冷，可是被问及是否觉得冷，我们却回答说：‘不，我们心中有一个红太阳，倍感温暖……’”

1971年，李振盛夫妇离开了干校。文革还在进行，但他的那些底片仍然完好保存在地下。不过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及四人帮下台后，李振盛才最后觉得安全，开始对之进行整理。“那时，我已经相信这些映射文革阴暗面的照片能够得以向公众展示。”李振盛说。

1988年，在一次有关文革前后三十年“艰钜历程”的全国摄影公开赛上，李振盛应赛事组织者的请求，以“让历史告诉未来”为题展出了其中的20幅照片，并获得最高奖——系列新闻照片大奖。

其后，开达新闻图片社（Contactress Images）总裁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发现了李振盛。但是他们的合作因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告吹。1996年，李振盛应邀赴美国讲学，再度逢遇普雷基，有关合作重新启动。李振盛珍藏的照片开始被他分批运至美国——起初还是偷偷的，后来则根本不必担心会被抓住。2003年6月，由普雷基担任策展人兼总监的“李振盛摄影作品全球巡回展”在巴黎摄影历史博物馆首展3个月，随后在欧洲12个国家博物馆巡展至2006年底。该影展还将陆续在美洲及亚太地区各国巡回展览。

普雷基说，据李振盛估计，在1963年至1976年间他总共拍了大约十万张照片，但其中有三分之一被他自己裁弃了。剩余的六万多张中，有一半以上与文革有关，大多具有新闻或资料价值。

至于由这些照片来而的《红色新闻战士》一书，李振盛和普雷基考虑到在照片外，加有个人文字叙述和历史背景，效果会更好，因此邀请纽约记者梅内奇（Jacques Menasche）制作了一份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并协助李振盛撰写成回忆录。

在6月27日的展出后，李振盛有种终获大白的感觉——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文革的真相才得以通过这些照片向世人展示。不过李振盛希望这“世人”也包括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国人，“亲眼看到这些照片，知道有关文革的说法是真实的。”他在展览会上说。李振盛相信，他的《红色新闻战士》一书很快也可以在中国出版发行。

□ 原载《华盛顿观察》周刊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